



涉外专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双语教学探究

李海文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福州 350002)

摘要: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课程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双语教学改革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涉外专业。涉外专业相比其它专业,有着涉外的特殊性,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施双语教学的重要契机。通过教改文献调查和实践探索发现,在新时代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在涉外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在方法上具有可操作性。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仅是授课语言的变化,更是话语材料的丰富、课堂互动的加强和学生圈内思维的拓展。

关键词: 双语教学; 术语; 话语; 意识形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2-0108-07

Exploration for bilingual teaching of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for foreign-related majors

LI Haiwen

(Jinshan College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bilingual teaching reform of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s relatively rare, especially in foreign-related majors. Compared with other majors, foreign-related majors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iti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bilingual teaching in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theories, it is found that bilingual teaching of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 foreign-related majors is of realistic necessity, feasibility in practice, and operability in method in the new era. Bilingual teaching not only involves the change of teaching languages, but also expands the enrichment of discourse materials, the enhancement of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Key words: bilingual teaching; terminology; discourse; ideology; The Conspectu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教学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近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教学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学生的“抬头率问题”依然是一个痼疾。在思政课课堂上,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欠缺,究其原因,除了教学话语较为枯燥乏味外,还在于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不足,以致于学生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如专业课。纵

观近年各大高校的思政课教改,主要在于形式创新,比如话语转换、引进新媒体、信息化教学、实践教学等方面。^[1-2]当然内容创新也有,主要体现在“课程思政”^[3],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穿插或伴随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程内容相对稳定,功能明确,可供增值之处不多。它主要是通过史实回答政治问题,因其叙事简洁,学时有限

收稿日期:2019-05-08 网络出版日期:2019-09-16

基金项目: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x180902);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思政课程”教育教学精品改革项目(jx190902)

作者简介:李海文(1985—),男,福建龙岩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文化传播史论方面的研究。

(理论部分通常只有32学时),不可能通篇采用故事话语,因而如何提升课程的含金量、增强学生的获得感成为教学改革的关键。当前各高校在此课程的教学和建设中,大多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手段的技术化,少有从授课语言形式上进行教学的突破和革新。查阅关于“纲要”双语教改的文献可知,刘朝华^[4]、李松等^[5]主要是从教学目标、模式和效果等角度探索,缺乏深入的系统分析和具体案例的实证研究,也未有接力研究,可谓浅尝辄止。笔者根据教改实践,结合理论探讨,提出对涉外专业“纲要”课程实施双语教学,试图探究开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方法,推进思政课的双语教学研究,希冀指导实践。

一、“纲要”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本文探讨的双语教学是指采用中英两种语言,面向的本科涉外专业主要是指英语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及中外(英语国家)合作类专业。2018年全国本科院校共有1245所,其中设有英语专业的高校将近千所,英语专业成为各大高校最普遍设立的专业之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前身是对外汉语专业,全国开设此本科专业的高校将近400所。截至2018年9月,本科层次的中外合作项目有789个^①,中外合作类专业亦为常见。因此这三类专业学生人数众多,加上学习和生活方面经常接触国外信息与知识,对他们进行“纲要”双语教学是思想意识形态教育中的关键一环。

(一)英语能力是刚需,增强学习驱动力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英语是工具中的工具。对于上述三类专业的学生而言,掌握英语已是必备的技能。如果把英语融入思政课堂,“纲要”的含金量立马提升,将会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在新时代下,从“供给侧”发力,以学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6],满足学生的有效需求,是“纲要”教改的主要目标。通过“纲要”课程双语教学,学生除了学习思政内容,还可以学习英语知识,拓展思维方式,提升英语交际能力,同时促进他们对主干课程学习,如“中国文化通论”、“跨文化交际”等,可谓是一箭三雕,事半功倍。

(二)国际视野是抓手,助力提高思政教学水平

英语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还可以成为认知工具。学习英语,有利塑造学生的国际视野,从全球角度观察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其起伏兴衰与国际社会密切联动,中国近现代史成为

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脱胎于中国近现代史,其教材所言大事,诸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无一不关涉国际因素;所谈的“四个选择”问题,莫不与世界充满联系。同一事件,史料国内外皆有,“纲要”讲授有可能也有必要避免自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视野要广,要有国际视野^[6]。国际视野不仅是一种思路,而且是一种方法,还是研究和讲授“纲要”的着力点。采用国际视野,统筹国内外学术资源,可以利用西人言说为我所用,加强话语权。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之一,“纲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变,面对着纷繁复杂、暗潮涌动的国外不良思潮,“纲要”教学更应直面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坚守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正如复旦大学的朱潇潇学者所言,“理想的‘纲要’课教学,除了必须传递完整准确的史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还应该帮助学生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7]双语教学不仅仅是话语形式的丰富,对于学生而言,更是思维的开拓与视野的对比。正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的一书《他者中的华人》(《Chinese among Others》),文如书名,对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现象做出了新解,展现了另外一番意义。“纲要”教师通过内在视角和外视角,利用国际视野,洋为中用,更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提高思政教学水平。

(三)思政课双语教改,助力打造教育新特色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国际化如历史之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工作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八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涉外专业“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要达到所开课程的5%至10%”^[8]。随后,教育部将双语教学作为本科教学评估的一项指标,专业类课程早已开展双语改革,

^①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所公布的名单,参见:教育部关于批准2018年上半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通知[EB/OL]. (2018-08-27)[2019-05-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moe_862/201809/t20180903_347081.html.

但思政课作为公共课程,其双语教学进展缓慢,未有大的突破。“纲要”若能开展双语教学改革,不仅有利于打造思政教育新特色,提高教学质量,而且还可面向留学生,提升办学水平,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就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只有个别院校开设了“纲要”双语课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淮南师范学院、桂林医学院等,“纲要”双语教改还存在着广大空间。

时代呼吁“纲要”双语教学深入改革,探索授课特色。当下网络精品课程不断上线,尤其是慕课(MOOC)在教育界与科技界受到广泛青睐。在“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平台,“纲要”课程已上线十几门。这些精品课程名师效应明显,对普通院校的学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也给广大教师也带来较为严峻的挑战,因为“高校教师在面对慕课课程的大量上线时已经失去了掌握知识的优势,产生了职业恐慌”^[9]。普通院校唯有不断提高线下课程的含金量,打造特色才能应对这一挑战。开展双语教学,加强师生互动,优化学生的课堂体验,是破解冲击的有力一招。双语教学不仅可以坚守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文化国际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拓宽国际视野,创新思维方式,帮助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地认知历史和政治,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纲要”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纲要”开展双语教学具有很大的必要性,而其成功与否在于“三教一生”,即教材、教师和教法以及学生四大方面条件是否满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不断推进高校内涵式发展,为“纲要”双语教学提供了许多可行条件。

(一)教材资源较为丰富,提供了教学改革开发基础

“纲要”教材一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即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可以此统编教材为纲,选择相关英语教材教辅,逐步自编教材;双语教学可采取“汉语教材+英文讲授”模式开展,学生使用统编汉语教材。另外,中国史研究早已国际化,海外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不少,值得批判式使用。相关的英文版图书可作参考的有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系列(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Selected Readings in History》(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Belknap Press: An Impri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China: A 5000-Year Odyssey》(New World Press, 2017)等。国内编写双语教材有《历史专业英语》(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史学专业英语》(群言出版社, 2008)、《历史英语文选》(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a History: 1840-1949》(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历史学专业英语新编》(长春出版社, 2013),其它资源有《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oncise History》(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等。这些著作出自名家之手,史论结合,相对权威,为书本话语转换成课堂话语提供了开发基础。授课讲师可以结合本校学情进行有机整合,出炉一套难度循序渐进的课件和讲义。

(二)师资水平不断提高,授课教师的英语水平能够统筹胜任

近年来,“纲要”课程新进校的任课教师基本上具有博士学位,非博士学位的教师也在努力提升学历,加强教学能力建设,师资水平可谓日益提高。大部分任课教师都已通过 CET-6 考试,甚至还有留学或海外任教经验(如交换生、联培生、孔子学院志愿者等)。“纲要”课青年教师大多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和各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研究生阶段基本上接受过专业外语等双语课程的训练,成为双语师资选拔的重要对象。随着高校进修和培训项目的日渐丰富,尤其是境外访学的增多,加上教师本人的努力,越来越多青年教师具有能力或潜力承担“纲要”双语授课的任务。在开设涉外专业的院校,英语教师、学科建设等相关资源本身就相对丰富。退一步而言,“纲要”授课教师即使单枪匹马难以胜任的话,还可以改变授课方式,运用集体的智慧与力量。采取团队授课方式,整合中外教、思政与英语专业教师、校内外师资资源,可以扬长避短,打造出一支双语授课队伍。

(三)其他课程的双语教学经验丰富,提供了教法借鉴

从 2001 年开始,作为一种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理念,双语教学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和采用。中国双语教学不断开展,一些重点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较早引进了双语教学理念,使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取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诸如地方性院校、民办院校,甚至高职院校等不断发力,探索双语教学。这些

院校的课程实践和理论探索,犹如他山之石,为“纲要”双语教学提供了有益参考。另外,教育部思政司大力提倡“手拉手”集体备课,群策群力,共谋教学发展。“纲要”可以而且应该集体备课,不仅在思政内部教师之间,还可以邀请英语专业教师和其他双语课程教师参与备课,共同打造适合本校学生的一套教法。

(四)涉外专业的学生有意愿且有能力学习公共课的双语课程

当然,作为教学对象,学生英语水平也必须考虑。涉外专业学生的英语基础相对较好,因为招生条件之一便是英语要符合一定水平,通常要达到60%的分值,甚至还有口试成绩的要求。他们对英语比较感兴趣,开设英文或双语课程多,比较愿意和有能力攻读公共课的双语课程。笔者曾对本校2017、2018级英语专业的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对2017级在上完常规课程之后发放,对2018级在双语课程开始之前发放),发现绝大部分对英语感兴趣,80.64%同学认为“纲要”课程有必要或者非常有必要开设双语教学。国内已有一些中学如外国语学校、大学附中等在高中阶段开展了历史双语教学,编写了《开辟新航路:中学生学科英语阅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双语教师手册:中学历史和地理分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等教材教辅,为“纲要”双语教学奠定了一定的教学基础。“千禧一代”的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中小学英语教学水平也越来越高,他们的水平整体比90后要高一些。根据2018年瑞典教育机构英孚发布的报告,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6位,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①。由此观之,“纲要”在涉外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具有较大可能性。

三、“纲要”双语教学的四大着力点

开展“纲要”双语教学并非为了双语而双语,英语只是一种重要手段,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是根本目的。如何开展必须围绕教学的根本目的寻找切入点。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得出,通过术语翻译、英文史料、英文互动等方面,“纲要”双语教学大有可为。

(一)术语翻译透视本质,词性色彩彰显意识形态

在语言学中,词汇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作用巨大。术语对于学科,好比词汇对于语言。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如何进行术语

翻译是双语教学的重中之重。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将意义划分为七种: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折射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10],得到业内认可。首先比较术语中英版本的概念意义,不少中文的意义更为模糊,更具抽象性。有些专有名词比如“会审公廨”“苏维埃”“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近代以来产生的词语缺乏历史土壤,让人难以对接认知结构,不易理解其意思。倘若使用对应的英文,则是“Mixed Court(混合法庭)”“Soviet(代表会议)”“Guild Socialism(行会社会主义)”等将更为直观形象、浅显易懂。在内涵意义方面,有些专有名词比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流砥柱”等意思比较模糊,让人难以理解。倘若使用对应的英文,则是“The Monumental Event(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事件)”“The Firm Rock in Midstream/Backbone(激流中的磐石/脊柱)”等,它们的引申义或比喻义就通过英文表达呼之欲出,便于理解。

值得重点一说的是情感意义。尽管历史声称客观公正,然而史书则是由人而写,字里行间无不蕴含着作者的史观。比较中英双语的情感色彩,英语倾向褒贬同词,汉语倾向褒贬异词。^[11]例如,“restoration”意为恢复与复辟,“overturn”意为推翻与颠覆,如果把中英双语的术语放在一起,就容易发现双方的立场与观点。比如,“抗日战争”倘若翻译为“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第二次中日战争)”或“Anti-Japan War(反日战争)”就模糊了正义与邪恶。其中的“Anti”虽然具有“对立”之意,但无“抵抗”被迫应战的意思。此外,它还偏向贬义使用,蕴含实施主体的邪恶性,如“反共(Anti-Communist)”“反社会(Anti-Social)”,因此“抗日战争”宜翻译为“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另外,“抗美援朝”也类似地不宜直接套用西方说法“Korean War(朝鲜战争)”,而宜针对性地翻译为“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对于“解放战争(The Liberation War)”,大都西方人同样缺乏正义立场,视为“The Chinese Civil War(中国内战)”,言下之意是国共争权夺利的战争。实际上,抗战之后国内出现过和平发展的机遇,共产党主和,然而国民党却主战,一意

^① 数据源自英孚发布的《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2017版)第7页,该报告下载于瑞典英孚机构官网 <https://www.ef.edu/epi/downloads/>。

孤行发动了所谓的内战。翻译在表面上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实际上是文化上的一种交流,“跨文化是翻译的根本特征”。^[12]话语如何表达必然夹杂编码者的情感,把中英话语放在一起,就容易发现蕴含其中的意识形态。

就中国内部而言,清王朝与革命势力、国共两党、国民党左右翼的相关话语通常是对立的,西方的立场或观点通过翻译亦可洞悉意识形态。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从清王朝立场来说是“The Taiping Rebellion(叛乱)”,从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说就是“The Taiping Revolution(太平革命)”,而当下主流意见则是“The Taiping Movement(太平天国运动)”。同理,“义和团运动”一事,分别对应是“The Boxer Rebellion(拳乱)”,“Boxer Uprising(义和团起义)”和“Yihetuan Movement(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国共两党曾有合作更有对立,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话语并不相同。例如,在国民党历史文献中所谓的“四一二清党(April 12 Purge)”在共产党话语体系中被表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April 12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或“四一二惨案(April 12 Tragedy)”。国民党脱胎于同盟会,派系林立,并不团结。对于“福建事变(The Fujian Incident)”,右派称为“福建叛乱(Fujian Rebellion)”,左派则为“闽变(The Fujian Incident)”。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美国欲派使团赴延安考察,该使团的命名成为一则典型案例。美方最初是想将使团称为“美军代表团”或“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但蒋介石觉得称为“团”规格太高,要求改为“视察组”。“视察”通常在上级对下级时才使用,这种称谓对中共方面来说显然不适合。最后,经美方、重庆、延安三方协商,将代表团的名称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通常所说的美军观察组。美国人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绰号,叫做“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迪克西”意指美国内战时期叛乱的南方诸州,在这里则暗指陕北解放区)。对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称呼,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多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研究历史从当下出发,每代的历史教育断然是为那一代人服务的。通过术语翻译有利于透视本质,区分关键词语的褒贬色彩有利于洞悉意识形态,进而发现话语者的立场。这些历史术语和史实还可以对接涉外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的“言语符号与行为”、“种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等知识要点。

(二)“西经”注我,增强思政话语的说服力

大学生绝大部分已成年,具有一定的学科知识和判断能力,思政教学论证观点不宜“一言堂”或采用“一家之言”,单一信源难以让人信服。尤其是在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学生通过手机获取信息信手拈来。各种不良思潮也夹杂而来,严重混淆学生的视听。教师可以因势利导,乘势而为,挖掘英文史料辅证观点,“西经”注我,提高思政话语的说服力。

例如,关于红军长征,国民党史学认为红军乃是逃跑,我们却认为是战略转移。在讲述这个问题时,有不少学生第一感觉也是认为逃跑。除了用传统材料论述战略转移的观点外,教师还可以而且应该运用第三方的观点,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军事史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等人的说法,加强说服力,给予学生彻底正确的认知。斯诺在描述长征时所用的词语是“retreat(撤退)”“withdraw(撤出)”“trek(长途跋涉)”“move(移动)”“migration(迁移)”“great exploit(伟大业绩)”等;^[13]格里菲斯称之为“magnificent feat(雄伟的壮举)”,史沫特莱称之为“great epic(伟大史诗)”,美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称之为“史诗般”^{[14]248}。再如,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问题?“纲要”教材主要是从党的民族担当和责任意识来解释,说法比较笼统,论证略显乏力。除了教材解释外,倘若加上西方学者的“国共比较”观点,将会有域外特色,增强说服力。例如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认为“用常规的阵地战是打不败日本军队的,只有用游击战法才能消耗他们的实力”;^[15]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认为“中华民族真正力量不在沿海的大城市、省会,而是在乡村、市镇……乡村将变成抗战的真正核心”;^[16]美驻华使馆人员写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和最有建设性的统一中国的力量”;^[17]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认为“毛泽东的军队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坚定、英勇和顽强,并且大体戒除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农民所常带的鲁莽的恶习。”^[18]诸如此类,都直接叙述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做法、活动场所和表现等,进而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台柱子”作用。这些西方人士的观点并未“明示结论”,而是“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更具传播效果。当然,在“纲要”教学中,对具有

争议的观点的原文和中文翻译都应同时出现,以示真实,增强说服力。

(三)活用英语增强互动,体验学习入脑入心

“纲要”课堂教学融入英语,不仅拓展学生思维,而且还增加互动环节,活跃课堂气氛。《大学英语》课程的互动方式如朗读、翻译、情景剧表演等,都可有机融合到传统“纲要”课程中。其中翻译关键词语时,要求学生运用比较方法,加深历史认知,实践证明颇为有效。例如,当提及日军 731 部队时,说其“广为人知”,如何翻译?根据笔者课堂实践,学生回答不一,以“well-known”居多。实际上,此处不宜用“well-known”(出名的,中性),更不能用“famous”(著名的,褒义),而应该用“notorious”(臭名昭著的,贬义)。

有些英语词褒贬兼用,主要体现在语境中。例如“thanks to”通常翻译为“多亏”,但它具有褒义也有贬义,学生在翻译时往往不到位。“Thus, in the Far East, thanks to the Japanese fascist imperialists, there also arose the first seat of war.”此句是说“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作祟,就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其中“作祟”二字鲜有人想到,加上则立场鲜明,信达雅皆有之。还有对“国民党”的翻译,尤其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应用“Kuomintang(KMT)”,不宜用“Nationalist Party”。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大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不再是大革命时期的“四大阶级联盟”(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19]国民党并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应避免使用“nationalist(国民)”一词。另外,如今的民主党派是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倘若译为“democratic parties”,隐含意义可能是中共不是一个民主的党,所以宜译为“MinzhuDangpai”或“Minzhu Parties”,^[20]这样才能够准确表达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通过英汉对比,小中见大,分析更到位,记忆更深刻。正如西方有句名言:“Tell me, I will forget; show me,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I will understand.(告诉我,我会忘记;给我示范,我可能记住;让我参与,我将理解)。”^①活用英语可以引入体验学习的方法,升级改造传统的“纲要”教学,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点和价值观的入脑入心。

(四)通过双语教学构建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国形象

涉外专业的学生因其学习和未来工作的涉外性,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只有知己知彼,认知准确,方能有效传音。历史、政治与英语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学生对国史国情的认知,有利于学生构建准确的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国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晚清,中国与朝鲜应是宗藩关系,却被西人德里质疑^[21]。倘若认同把朝鲜译为“Tributary State(朝贡国)”而非“Vassal Sate(藩国或附属国)”的话,不仅不符合史实,而且还中了西方美化侵略的圈套,立场颠倒。实际上,同为美国人的克雷格认为“朝鲜自视为中国的附属国^{[14]248}”,也有力反驳了德里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政府机关的“宣传部”被翻译为“Propaganda Department”,其实并不恰当。“propaganda”曾被德国纳粹使用,在西方已具有了贬义色彩,宜改为“publicity”。然而,现实当中还有不少地方使用“propaganda”。对于国家领导人描述词语如政治家,要旗帜鲜明地使用“statesman(褒义)”,而不主张采用“politician(褒贬兼用)”,以免混淆视听。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翻译“工人”时用词应是“worker”或者是“proletariat(无产阶级)”,不宜使用“labor(劳工)”。因为英国的知名党派“工党”对应的英文是“Labor Party”,它虽然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口号,但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奉行马克思主义。谁先用某个词,经大众传播之后谁就占据了赋予某个词的一些特殊属性的先机。生搬硬套,盲目对接,必将不利于精准传播中国形象。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上有多个版本,哪怕华裔学者翻译也得慎重,如谭中教授的“The world common entity of destiny”^[22],具有些许宗教宿命论的色彩,不太符合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要积极推广使用中央部门核准的“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23]。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接下去要重点解决的是“挨骂”问题。^[24]破解“挨骂”,在于提高话语权;提高话语权,必要条件是了解内外,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准确发声。构建现代中国话语体系,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跨越文化差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

① 该名言转引自祖晓梅.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215.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25],第一时间准确发声,才能正面传播中国形象。

以上四个方面不仅是开展“纲要”双语教学的着力点,也是授课教师的重点和难点。这就需要学校、教师和其他各方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在物质上增加投入,加强研修,充分备课。

四、结 语

“纲要”课程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仅是授课语言的变化,更是话语材料的丰富、师生互动的加强和圈内思维的拓展。融入英语并非单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具有“思想库”效应。在涉外专业开设“纲要”双语课程,具有较强的现实必要性,一是英语作为刚需可以增强学习驱动力,其二国际视野的拓展有助于提高思政教学实效,三是思政课程双语教学助力打造教育新特色。时至今日,开展“纲要”双语教学已经具有较充分的可行性,核心的“三教一生”问题可以统筹解决。同时它在方法上还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一是术语翻译透视本质,词性色彩彰显意识形态;二是“西经”注我,提高思政话语的说服力;三是活用英语增强互动,体验学习入脑入心;四是通过双语教学构建中国话语,正面传播中国形象。笔者通过两轮教学,运用调查问卷、期末试卷、个别访谈等手段测试教学效果,大部分学生客观指标良好,主观上给予了正面评价,觉得收获不少。学生的信息输入更加多元辩证,课堂体验更加丰富有趣,知识输出更加清晰可靠。当然“纲要”双语教学实效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和较长时段的多轮检验。总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双语教学是一座富矿,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借此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 [1] 杨焕宇.任重道远开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新征程:“改革开放四十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7):147-149.
- [2] 黄蓉生,崔健,唐斌.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J].中国大学教学,2018(8):12-18.
- [3] 钱欣,曾宁.高校推进“课程思政”研究述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6):155-157.
- [4] 刘朝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双语教学的目标、模式及效果评价[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74-76.
- [5] 李松,朱冠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双语教学”应用初探[J].宿州学院学报,2009,24(3):155-157.
- [6]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19(01).
- [7] 朱潇潇.在开放的视野中认识世界和中国:以两轴教学法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效果[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0):136-140.
- [8]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2001-08-28)[2019-03-12].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23/201006/88633.html.
- [9] 金丽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0):119-122.
- [10] 杰弗里·利奇.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3.
- [11] 马彪,冯莉.英语“褒贬同词”现象考察研究:兼与汉语比较[J].外语学刊,2010(5):69-73.
- [12] 蒋洪新.新时代翻译的挑战与使命[J].中国翻译,2018(2):5-7.
-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英汉对照[M].董乐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289-331.
- [14] 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M].李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15] 约翰·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M].刘尊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31.
- [16] 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M].林淡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275.
- [17]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M].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949.
- [18] 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全球史[M].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15.
-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
- [20] 杨红燕,姚克勤.近二十年汉语政治新词新语翻译研究述评[J].人文杂志,2017(12):64-70.
- [21]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6.
- [22] Tan Chung. China: A 5000-Year Odyssey[M].Beijing: New World Press, 2017: 276.
- [2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Ⅱ(英文)[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88.
- [24] 陈开和.中国话语怎样解决“挨骂”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6-16(001).
-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责任编辑:王艳娟)